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

四

浙江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编集·吴光主编

当代新儒学探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新儒学探索 / 吴光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4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

ISBN 7—5325—3388—3

I. 当... II. 吴... III. 新儒学—研究—现代
IV. B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708 号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

当代新儒学探索

吴 光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4 字数 315,000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7—5325—3388—3

B·395 定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64063949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编委会名单

特邀顾问：杜维明 万 斌

名誉主编：龚鹏程

主 编：吴 光

编委会委员：吴 光 赵昌平 戚国雄 欧崇敬

林安梧 陈 来 姜广辉 宋智明

罗义俊 杨国荣 张晓敏 罗 颢

徐 斌 陈剩勇 王立嘉 董 平

朱晓鹏 汪俊昌 陈永革 钱 明

徐儒宗

责任编辑：罗 颢

助理编务：宋洪霞

主办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

出版单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文化研究集刊》 第一至五辑书目

- 第一辑 中华人文精神新论(已出)
- 第二辑 阳明学研究(已出)
- 第三辑 中华佛学精神(已出)
- 第四辑 当代新儒学探索(已出)
- 第五辑 中华道学与道教(待编)

期待适应新世纪需要的新儒学

——《当代新儒学探索》导言

吴 光

除旧布新，继往开来。人类告别了战争与和平交替、灾难与发展并存的二十世纪，怀着创造的激情，抱着无限的期望，大步迈入了二十一世纪。

在世纪交替之际，形形色色的分析家、预言家、政治家、思想家都在逞其智力，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设计蓝图、指示方向。有预言文明冲突、寻求文化霸权者，也有推动文明对话、主张普遍和谐者；有主张全球西化（实即美化）者，也有企求中国世纪或亚洲世纪者；有推销全球一体化者，也有倡导“多元一体化”或“一体多元化”者，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令人目不暇接。

在我看来，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走向的基本态势是“五化”：一是经济全球化，或曰经济一体化，全球各大经济体都将遵循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游戏规则，既有竞争，又有协调；二是政治多极化，在世纪之初是美国一极独强下的多极化，在世纪中后期则可能是美、欧、中、俄、日、印等多个轴心各分秋色的多极化；三是

社会现代化,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将经历现代化的洗礼,建立起民主、法治、和谐的现代文明社会;四是文化多元化,即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东方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穆斯林文化等多元文化系统的共存、竞争、冲突与对话;五是价值普世化,尽管在可预见的一百年或数百年中,全人类大概还不可能建立一个大同的、普世的文明,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数千年历史所积累起来的民主、人权、平等、仁爱、和谐、诚信等原本分属于西方或东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将不再区分东西,而日益成为全人类一致接受的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这一大趋势,并非是个人的异想天开,而是经由许多有识之士做了深刻分析从而呼之欲出的历史趋势。

然而,当今的人类在走向光明未来的道路上却荆棘丛生,充满陷阱与误区。在“五化”大趋势下,出现了许多非理性甚至是反人性的弊端。例如,一方面是经济长足发展、实力膨胀、生活品质的改善、提高,另一方面却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分配的不公与严重浪费;一方面是科技日新月异(如知识经济、网络经济、虚拟世界、生化技术、克隆技术等等),另一方面是暴力、走私、贩毒等犯罪的智能化与国际化以及人伦的危机、道德的堕落;一方面是人类强烈要求和平、文明与发展,另一方面却是恐怖主义、邪教、霸权与战争在威胁人类的安全。特别是由一小撮国际恐怖分子制造的“9·11”袭击美国经济、政治中心的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由美国带头开展的“国际反恐战争”,更是突出反映了当今人类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于是,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都在反省与深思应对的战略策略,提出解决之道。

那么,处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的儒学,在新世纪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中应有什么样的地位与作用?儒学对于解决当代与未来社会的重大问题有何助益?它对人类文明发展和文明对话可能

提供哪些资源、作出什么贡献？新世纪儒学的发展前景及其可能的理论形态是怎样的？这是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应当研究与思考的问题，也是当代新儒家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当此之时，我们回顾逝去的世纪可以看到，儒学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剥尽而复”、“否极泰来”、由衰转兴的局面。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其道德人文精神，虽在中国经受了近百年的猛烈批判而弦歌不废，真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了。在世纪中后期，在海峡两岸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所谓“现代新儒家”，其思想领袖殚精竭虑，创立了从本体论到方法论都有很大差异的几种“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如所谓“新唯识学”、“新心学”、“新理学”等等。到了世纪之末，在中国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向来淡泊的儒门竟因二、三子的乘势推动而蔚然形成国际性思潮，并且涌现出了一大批阐论新儒学的学术专著和饱学之士。然而，尽管若干现代新儒学大师著作等身，建立了逻辑严密、境界高超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但他们的理论重心还是放在护卫道统、应付各种反儒学思潮对传统儒学的批评与挑战方面，始终没有能圆满解决“本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传统的儒家人文精神如何与现代文明、时代精神相沟通乃至会通融和的问题。对此，一些较其前辈更具全球眼光、开放胸襟和多元文化视野的现代新儒家的后起之秀——当代新儒家学者——已经认识到其前辈们的时代局限和理论缺失，开始从解决新世纪面临的新问题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儒学的因应之道，着手修正、改造或重建由其前辈所开创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有的甚至从全新的理论角度建构其当代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正在形成比较切合新世纪大趋势需要的当代新儒学思想体系。

我们组织和编辑这部专辑的目的，就是试图紧扣时代脉搏、

把握思想新潮,从一个侧面——儒家文化与新世纪的关系这个侧面来研究、回应当今世界的问题,提出儒家的解决之道。当然,这个“解决之道”不是着眼于当前功利性的,而是放眼人类长远利益的,不是技术性的施政方案,而是理论性的思想探索。我们所期待的是真正能够适应新世纪需要的当代新儒学,而这种“当代新儒学”并不是唯一不二的新宗教,而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性思想群体。

作为《中华文化研究集刊》的第四辑,本辑共收录了21篇论文。这些论文的作者,有好几位是国内外知名的新儒家学者,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先生等,他们不仅对传统儒学有系统、真切的了解,而且对当代新儒学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和精辟的理论创新;有几位是当代新儒家的理论探索者,如林安梧、李明辉、罗义俊、颜炳罡先生等,他们既对其前辈的学说做了较深刻的反省,又能提出自己的比较系统化的理论新说;有几位则介乎儒与非儒之间,或者是抱持客观主义研究态度的学者,如龚鹏程、王邦雄、钱逊、杨国荣、欧崇敬先生等,他们的论文往往更具理性、客观的特色,在对儒学与新儒学的批判、分析和展望中,有着精到的睿识与深刻的洞见;有的则是刚刚步入学术界的青年学者,他们对当代新儒家学术思想的分析也有其个人的体悟与独特的见解。当然,也有传统儒学与当代新儒学的批评者,如启良先生,他针对儒家的根本性理论——“内圣”之学做了深度的质疑与批判。

我们按文章性质及其所论主题,将这21篇论文分成六组。第一组收录了刘述先、杜维明、蔡仁厚、吴光的四篇论文,其主题大致是在批判性总结以往两千年儒学发展史的理论形态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图从理论上回应当今世界的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或探索与展望新世纪儒学的新形态。其中,刘述先提出了在

“世界伦理”观照下新儒家的“理一分殊”规约原则的理论,杜维明强调了“文明对话”论和“新轴心时代的儒学资源”论,蔡仁厚论述了融摄儒释道三教、会通中西文化之说及其“由德性主体开显知性之用”的理论,吴光则从对儒学史的回顾和对新世纪儒学的展望中提出了“民主仁爱为体,科技法制为用”的“民主仁学”之发展可能。第二组收录了成中英、李明辉、杨国荣、赖贤宗的四篇论文,其主题是儒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以及新旧儒学的比较分析。其中,成中英从对中国传统的德行本体伦理和现代西方的权利伦理的比较研究中,探讨了促成东西方伦理的沟通、结合与融合以建立“全球伦理”的问题;李明辉通过比较哲学研究,论述了儒家伦理思想与西方哲学家康德的“存心伦理学”及韦伯的“责任伦理学”之异同;杨国荣的论文以孟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心,着重分析了儒家政治哲学与近代民主政治理念沟通的可能性;赖贤宗对德意志观念论与当代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作了具体的比较研究。第三组收录了龚鹏程、林安梧的两篇颇具思想深度并且独辟蹊径的论文,其中龚文从与当今一般新儒家学者谈论道德心性之学完全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当代儒学重建的方向,认为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学的实践性,让儒学从社会生活中全面活起来;林文则从“存有学”的立场重新省思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并借用“境识俱泯”、“境识俱起而未分”、“以识执境”及“存有三态论”的架构来阐明科技发展与人文重建的可能。第四组收录了梁承武、颜炳罡、钱逊、蔡方鹿的五篇论文,其主题是探讨儒家人文精神的时代意义及其与新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其中,梁承武论述了儒家仁教思想的内涵及其特性,进而探索了仁教在21世纪人类社会中的实践方向问题;颜炳罡从对当代社会发展和儒学未来前景的双向审视中,展开儒学与全球化、知识经济、网络文化及生命伦理的

对话、沟通和交流,提出了“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说;钱逊着重探讨了儒家“中和”思想在新世纪的意义,蔡方鹿从儒学与发展科技、参与文明对话、推进民主法治等多方面的结合上论述了新世纪承传发扬儒学之途径。第五组收录了王邦雄、罗义俊、许宁、蒋国保、李建忠的五篇论文,其特色是从对牟宗三、马一浮、方东美、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大师思想体系的个案分析中,透析其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当代价值。其中,王邦雄精辟地分析了牟宗三在会通中西文化的哲学理念方面的重要贡献,并对牟氏“两层存有论”与“一心开二门”的理路架构及其“良知的自我坎陷”思想做了细致分析,进而提出了儒学自我转化过程的“曲成”说;罗义俊深刻地表达了他对牟宗三有关“全幅人性”理论的体悟与解读,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牟氏的人性论思想;许宁的论文系统考察了马一浮的判教观及其建构文化哲学体系上的实践;蒋国保的论文从本体论、知识论、方法论、人性论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方东美的东西哲学比较观,并分析了方东美从事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动机与目的;李建忠的论文则把冯友兰文化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五个阶段并做了中肯的论析。第六组收录了两篇反省与批评性的论文,其中欧崇敬以“孟子学”为典型说明新儒学开场的方式,进而分析二十世纪新儒家大师熊十力与牟宗三的儒学架构并进行了理论反省,主张新世纪的中国哲学应该突破由孟轲——熊十力——牟宗三一系的新儒学架构,不再眷恋于儒学、新儒学的旗号,而由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一切可发展内涵项去找寻哲学的世界对话;启良的论文严厉批判了儒家的“内圣”之学及其作为逻辑前提的“性善”论,认为历代儒者都没有深思过“内圣”有无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过于信任人的道德自我决定和自我完善的能力,此种途径的“内圣”之学不关乎人的利益,既缺乏道德的原动力,亦缺乏人

性的根据,其“内在超越”之理想也就只能落空。这类批评是也、非也?我们在此不作评判,而提供读者去分析品味,尤其希望引起当代新儒家理论家的重视,以作为其新儒学理论创新的借镜。

凡此种种,本文不必详加引述,读者只要细读本书就能明了,作者诸君的理论观点虽然未必圆满与成熟,甚至可能招致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我敢肯定地说,各篇论文确实都是各有心得、包含着值得仔细品味的洞见新说甚至有着理论的改革与创新之义的。它们不仅对读者有思想的补益,而且对于治理社会的积弊也未尝不是一剂良方。他们的真知灼见,把对儒学的研究与当代新儒学的探索推向了新的水平。因此,我们将本书定名为《当代新儒学探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当然,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未能如愿收录更多富有创见、水平很高的研究、论述当代新儒学的重要论文,这是应当向学界朋友们衷表歉意的。

(稿成于2002年8月30日,改定于11月8日)

目 录

导言:期待适应新世纪需要的新儒学	吴 光(1)
从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学的历史处境与文化理想	刘述先(1)
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及儒学的精神资源	杜维明(23)
新世纪的文化省思与前瞻 ——以当代新儒学的开展为主线	蔡仁厚(30)
从道德仁学到民主仁学 ——儒学的回顾与展望	吴 光(53)
论东方德行伦理和西方权利伦理的结合 ——人性和理性结合的道德正当性:权利与 德行的相互印证	成中英(79)
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与儒家思想	李明辉(115)
儒家政治哲学的多重面向 ——以孟子为中心的思考	杨国荣(143)
德意志观念论与当代新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	赖贤宗(163)

迈向生活儒学的重建

- 儒家饮饌政治学新探…………… 龚鹏程(180)
- 科技、人文与“存有三态”论纲…………… 林安梧(205)

论儒家仁教的内涵及其实践方向…………… 梁承武(215)

儒家的人文关切及其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

- …………… 颜炳罡(231)
- 儒家中和思想在新时代的意义…………… 钱 逊(261)
- 新世纪儒学承传发扬之途径…………… 蔡方鹿(275)

牟宗三先生会通中西文化之哲学慧命…………… 王邦雄(292)

全幅人性的了悟

- 读牟宗三先生的《才性与玄理》…………… 罗义俊(316)
- 马一浮的判教观及其实践…………… 许 宁(341)
- “二分对立”与“机体主义”的精神悖反
- 方东美东西哲学比较观抉奥…………… 蒋国保(359)
- 冯友兰先生文化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李建忠(382)

新儒学的开启与收场

- 从“孟子学”的儒家型态创造转化到熊十力、
- 牟宗三哲学体系的反省…………… 欧崇敬(402)
- “内圣”异议…………… 启 良(425)

从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学的 历史处境与文化理想

刘述先

【内容提要】 本文站在当代新儒家的立场上，回顾了清末以来儒家从中心到边缘又可能重返思想中心的思想发展史，描述了由梁漱溟开风气之先的第一、二、三代新儒家的思想形成史及其思想特色、历史处境，并指出当代新儒学的文化理想是强调不同文化的对话、沟通与交流，进而提出了作者本人的思想主张，即在“世界伦理”观照下重新解说宋明儒家的“理一分殊”规约原则的理论，断言这一规约原则将在新世纪日益受到重视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作者刘述先，江西吉安人，1934年生于上海。哲学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兼讲座教授，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研究员。著有《新时代哲学的信念与方法》、《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大陆与海外——传统的反省与转化》、《理想与现实的纠结》等多部专著和论文集。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以来，尽管实际上是阳儒阴法

或者儒道互补,政治化儒家的中心地位是不容否认的。汉代发展了伟大的文明,建立了所谓超稳定的秩序。佛教由印度传入,虽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并没有动摇社会的根本。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帝国主义入侵,造成了传统秩序的崩溃。清末士人还企图负隅顽抗,典型的例子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这种二元方式不足以挡住西风的疾卷。至戊戌政变失败,清朝覆亡,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失败,儒家成为了一切反动、腐败东西的代名词。1919年五四运动时流行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儒家已注定了边缘化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之下,新儒家应运而生,情况与春秋战国时周文疲弊、礼崩乐坏,孔孟反而为儒家的旧统注入了新的生命那样的发展,不无类似之处。恰好就像在现实最黑暗的当儿,反而提出了崇高的文化理想,依照《易传》的说法,所谓“贞下起元”,不正是这样的写照吗!张灏断定,清末民初中国人所面对的危机,乃是通盘性的精神意义层面的危机,⁽¹⁾这是一点也不错的。新儒家正是可以看作是针对这样的危机所作出的回应。

在这篇文章里,我对当代新儒家的理解是采取一种宽泛的说法,⁽²⁾约略相当于大陆所谓现代新儒学的意思。⁽³⁾大陆现在流行的看法是,现代新儒学产生在1920年代初。方克立说:

把现代新儒学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和这个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理论上和历史事实上还得到这样一个观点的支持,即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总是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而大致同时出现的。……这三派思想家都有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激情,都力图向西方寻找真理,来解决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现实出路问题,而又都想避免已经暴露出来的西方文

明的弊端。可以说他们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不过对同一问题的解决采取了不同的途径而已。他们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推动了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三派思想共同构成了五四时期文化启蒙的真实内容。⁽⁴⁾

这样的看法是有一定根据的。方克立举出了梁启超(1873-1929)、梁漱溟(1893-1988)为代表，倾向于保守主义。在这一脉络之下，对“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一词的理解是有其特别涵义的。他们决非抱残守缺之辈。梁启超一向热衷宣扬、介绍西方的东西，但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到巴黎去开和会，据说得到一些不利于中国的消息，政府立场倾向于向日本屈膝，梁乃故意把消息泄漏出去，间接激发了五四运动。他在欧洲看到的情况十分不妙，令他感到震惊，乃著《欧游心影录》(1919年)发表了自己的观感并引起了巨大的回响。梁漱溟率先对西化的潮流作出反应，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创人物。他自承不是学者，而是思想家，想实际从事一些对自己来说更有意义的事情。他通过演讲来宣扬自己的文化理想，在五四后三年就出版了震动一时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⁵⁾他把问题放在整套文化哲学的架构下来考虑。他认为人类基本上有三种意欲：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虽然他年轻时最向往佛教的解脱道，但后来感觉到印度与中国文化有早熟之弊，于是他才娶妻生子，作儒家的志业，为国家民族文化的持存而努力。他主张在现阶段，首先要毫无保留地全盘西化，和胡适的立场其实并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别。但发展到一个阶段之后，西方那种专讲功利竞争的文化不免漏洞百出，就要转趋中国重视人际关系、社会和谐的文化。

到最后人终不能避免生死问题,乃要皈依印度的解脱道。但梁漱溟并没有说明,这样的转变如何可以在实际上做得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一度承认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毛的社会分析更符合事实情况的缘故,后来因为他顶撞了毛而受到批斗。却以匹夫不可夺志而挺现了儒者的风骨。文革之后,梁出版《人心与人生》,⁽⁶⁾又回到原来的观点,以为唯物辩证法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还是未能妥善处理人的问题,必须回归中国文化强调社会和谐の泉源。梁一生尊崇孔子,西方学者艾恺(Guy Alitto)著书论梁,书名为《最后的儒家》。⁽⁷⁾等到他有机会亲自访梁时,却听梁告诉他,佛家的境界比儒家更高,令他大为震惊。⁽⁸⁾梁在事实上也决非最后的儒家,港台海外新儒家即不出于他的统绪。但他在西潮席卷之际,率先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还倡言以后西方文化也要走孔子的道路,并在逆境中以具体行为展现了一个儒者的风骨,他所提出的观念尽管粗疏,还是不能不推崇他为开风气人物的地位。

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不只启动了梁漱溟的文化思考,也激发了1923年所谓的科玄论战。⁽⁹⁾张君勱(1887-1969)与丁文江曾随同任公去欧洲。返国之后,在一次演讲中,张君勱指出科学背后的机械决定论的限制,而强调人生观要靠直觉,引起了丁文江的反击,好多学者卷入论战,成为一时盛事。张君勱援引的资源是倭伊铿(R. Eucken)与伯格森(H. Bergson),丁文江则是马赫(E. Mach)与皮尔生(K. Pierson)。这一场笔战的水平并不高,可谓情胜于理。张君勱过分强调了人生观的主观性而不免受到攻击,而丁文江辩论背后的立场其实是一套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然而就当时的声势而言,似乎支持科学一方面的人数众多而占了上风。但事后检讨,张君勱的想法与做法,决不会是反科学,⁽¹⁰⁾而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问题并不能由科学来解决。张